

成都与抗战时期的

中国空军

CHENGDU YU KANGZHAN SHIJI DE
ZHONGGUO KONGJUN

王 苹 许蓉生 胡越英 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序

王莘、许容生、胡越英三位学者编著的《成都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一书从一个人们相对陌生的侧面展示了四川人民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的伟大贡献。书中以详细的史实全面展示了成都作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空军的指挥中心，中国空军最大的抗敌出发点与后方基地，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和作为抗战中后期日本“战略轰炸”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及中国空军对日“战略轰炸”的第一个前进基地的历史面貌，填补了四川抗战史研究的空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面相再现了八年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对四川人民犯下的罪孽，再现了四川人民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进行的英勇战斗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现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过去 70 年了，四川人民、成都人民为整个抗战及为中国空军抗敌所做的一切都早已成为历史。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充满了悲情与浩气的历史，人们得到的历史启示十分丰富。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光明必然战胜黑暗、进步必然战胜反动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以鲜血、生命和史无前例的胜利留给我们的宝贵启迪，“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更是历史给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最高训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的短短讲话中 18 次提到“和平”，再次说明“珍爱和平”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启示，更是中华民族素爱和平传统精神的表征。本书中述及的中国空军从成都起飞的第一次对日远程轰炸是一次“宣传性、示威性”空袭，向日本各地投下的不是致人死命的炸弹，而是上百万份传单。其中的《告日本国民书》言：

我们大中华民族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人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的领土上作着怎样的罪恶。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的人，也有为军阀

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治，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这次轰炸发生于1938年5月。其时，中国人民的英雄正在徐州与日本侵略军喋血战斗，川军将领王铭章和为保卫藤县而牺牲的广大川军官兵的尸骨未寒，但中国的第一次对日远程轰炸仍然毫无以血还血之意，仍然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心平气和之语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军队践踏我国国土的野蛮行径，规劝日本人民致力维护正义与和平。这种带血的选择绝非偶然之举，而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精神千年传承过程中的一点足以照亮未来的闪光。

中国空军第一次对日宣传性轰炸昭示出的珍爱和平之精神贯穿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始终。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被迫开始了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全面抗日战争。但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非是以牙还牙，也不仅是被迫以武力捍卫本国的主权，而是不计本民族的牺牲以捍卫人类和平。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曾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抗侵略的奋斗”，不仅“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世界的命运”。^① 蒋介石也指出，中国的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也非单为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自由”，而是为了“奠定东亚中日永久和平之基础”，消除“人类幸福之隐患”。^② 学人胡适对此做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国”不仅仅是对中国的践踏，更是“世界和平被破坏的开始”；“中国民族抵抗日本”也不仅仅是中国捍卫主权之战，而是“世界民族抵抗暴力侵略的开始”。作为一个弱国，中国“从‘九一八’到‘七七’”“足足忍了六年”。这种忍耐“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的忍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真正爱和平的民族到了忍无可忍时候的抗战”。最终目的是要“帮助全人类建立一个有力量而可以永久世界新秩序”。^③ 国共两党和一些学人不约而同的见解表明，中华民族的抗战不仅是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而战，更是为世界和平而战。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3日，（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 Box Nos39, Folder Nos21。

^③ 胡适：《抗战五周年纪念》，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6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显示，当法西斯主义逐步席卷世界，人类临到灭顶灾难之际，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四大支柱对支撑人类正义大厦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即是中国、美国、苏联和英国。中国是四国中最弱的国家，却能在1937年8月率先向上海的日军发起主动进攻，投入70多万精锐之师血战3个多月。这是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第一场牺牲惨烈的大战。胡适对此曾做了如下论述：相对于日本，当时的中国“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新式的武器”，本来“没有抵抗一个头等海陆军强国的力量”，但中国却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来”“抵抗侵略”的国家。^①有正义感的国外学者也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把大部分日军主力吸引到中国战场，使日本背上了“超过负荷的沉重包袱”，在军事上、政治上发生了“尖锐的危机”。^②同时，中国抗战也惊醒了“许多民族的和平迷梦”，并给了“他们十多年的时间可以做一点抵抗侵略的准备”，^③为华盛顿、莫斯科、伦敦三大反法西斯世界支柱的相继树起争取到更多时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支柱缺一不可，而中国这根在国共合作基础上最先树起的支柱尤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最早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天空。而且，无论从主观上看还是从客观作用上看，中国率先反抗强敌、坚持八年抗战都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却又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这是中国精神，同时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广泛认同的精神，是人类未来永远需要发扬光大的精神。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付出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牺牲。但是，当日本败局逐步显露之际，中国上下首先考虑的不是复仇，而是如何重建战后和平体系。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重建战后国际和平体系的工作始于1942年《大西洋宪章》的签订。其时，中国抗战正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但国人对重建国际和平体系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胡适当时即表示，相信人类世界必然以“和平计划”取代“恶棍主义原则”。^④《东方杂志》的文章进而指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重建国际和平的会议不能只是战胜国处理战败国的会议，而应是重建世界和平的会议，因此，“不论交战国或中立国，都须出席”，共同“建立未来的世界和平”。文章明确指出，人类与“和平是不可分的”，建立战后和平体系与“战胜国、战败国及中立国都有关系”。处理战后问题的和

① 胡适：《抗战五周年纪念》，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796页。

② （英）克利斯多芬·J. 阿尔基勒著，周希春译：《战争中的日本》，载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编：《二战史通讯》第5期，1983年5月印行。

③ 胡适：《抗战五周年纪念》，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797页。

④ 胡适：《论战后新世界是之建设》，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795页。

平会议“必须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机构”，“战胜国与战败国都应当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共同为全人类谋幸福”。^① 作为一个近代以来饱受欺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尽艰辛的民族，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势虽成定局，但还在与日军殊死拼杀，还在喋血牺牲之际，中华民族首先考虑的不是复仇，而是要与包括敌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建立一个常设国际组织，以保证实现战后广泛的世界和平。如果没有一种历史长期积淀的文化精神起支配作用，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中国为国际和平做出的不懈努力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和世界未来的希望。历史早已向人类昭明，凡是企图以武力谋取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必将给人类带来灾难，而且也必将最终归于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等国试图以武力改变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世界格局，发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现代性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也给德国等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再次谋求以武力推翻不符合本国利益的世界格局，又一次挑起规模更大的世界战争。法西斯主义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造成了更为巨大的人员伤亡，把数不清的人类财富化为灰烬，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间悲剧。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仍然是战争发动者的灭亡。在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的今天，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回望四川人民、成都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的伟大贡献及为中国空军抗战建树的丰功伟绩，人们会感慨万千，会听到许多历史的深沉回响，但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及中国空军第一次宣传性远程空袭日本所昭示出的“珍爱和平”思想，却无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陈廷湘

2015年8月

^① 史国纲：《和平会议与国际会议》，载《东方杂志》，第39卷，第3号，1943年4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成都的自然、人文因素与抗战大后方的特殊地位·····	(1)
第一节 成都自然、人文因素及其在中国政治版图上的特殊地位·····	(1)
第二节 成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5)
第二章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状况和对日空中作战·····	(8)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中国空军的状况·····	(8)
第二节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	(16)
第三节 武汉会战之后中日空军力量的对比·····	(34)
第三章 成都与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	(37)
第一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中日战略态势·····	(37)
第二节 抗战中后期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情况·····	(39)
第三节 中国空军指挥中心在成都的建立及成都的空军基地·····	(46)
第四节 以成都为基地的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	(52)
第四章 成都与中国空军的人才培养和后勤服务·····	(69)
第一节 中国空军军士学校·····	(69)
第二节 空军幼年学校·····	(81)
第三节 空军机械学校、空军参谋学校和空军通信学校·····	(86)
第四节 成都的军用飞机制造修理机构和各种空军人才训练班·····	(88)
第五章 日军对四川以及成都的空袭和成都的防空作战·····	(90)
第一节 日本对中国大后方“战略轰炸”意图的形成·····	(90)
第二节 日本空军对四川战略轰炸的实施·····	(97)
第三节 日机对成都的空袭及中国空军的反击·····	(119)
第四节 成都防空作战的组织机构、人员和效果·····	(130)

第六章 盟军对日战略轰炸的实施和成都的重要贡献·····	(137)
第一节 “马特霍恩计划”——盟军对日战略轰炸计划的形成·····	(137)
第二节 “特种工程”，对日战略轰炸前进基地的修建·····	(141)
第三节 对日战略轰炸的实施·····	(147)
尾声 原子弹——对日战略轰炸的终结·····	(156)
附录：中国空军抗战大事记·····	(157)
参考文献·····	(171)
后 记·····	(174)

第一章 成都的自然、人文因素与 抗战大后方的特殊地位

第一节 成都自然、人文因素及其在 中国政治版图上的特殊地位

成都是一座具有悠久而独立的文化始源和悠久而独特的历史轨迹，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成都所在的巴蜀地区，曾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系统。在秦统一之前，成都是区域文明的中心。秦统一之后，成都成为历代中央王朝地方政权的首府所在，自古以来一直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千多年来，成都的命运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曾经登上繁荣的高峰，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也跌入过历史的低谷，经历了几度衰落与迟滞。

由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成都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位。成都地处长江上游、西南万山丛中，周边地势险要，交通闭塞。都江堰水利系统的兴建，造就了成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饶富庶，造就了成都发达的农业文明和城市工商业文明。从秦汉至唐宋，成都的富庶号称“甲于天下”，虽然僻处西南，但一直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赋重地之一，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富庶的物产和“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加上地处长江上游居高屋建瓴之势，使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常常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成都是统一大业的财赋重地，又同时兼具统一战争前进基地和后方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历代王朝的统一战争，常常以成都为军需供应的战略后方，挟巴蜀丰裕的战略物资，居长江上游高屋建瓴之势，顺长江而下进取天下。

成都的这种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的建立过程中就鲜明地表现出来。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起兵伐蜀，一举吞并了蜀国和巴国。就秦惠王起兵，秦国的朝廷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辩论。

战国中期以后，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只有楚国。秦国要想实现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宏图，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战胜楚国。秦国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平原，要进攻楚国，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是先征服东面的韩国和魏国，再从中原南下进攻楚国；另一条是翻过秦岭，征服巴蜀两国，然后顺江而下，攻击楚国的侧背。

当时，秦国君臣正准备进攻韩国，蜀国突然爆发开明王朝的内乱，使秦国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秦王召集群臣商议伐韩还是伐蜀。

大夫张仪主张攻韩。张仪认为，进攻韩国，取其三川之地，顺便可以灭掉附近的周王室，取得象征天下的“九鼎”，然后挟天子以令天下，从而奠定王业的基础。至于蜀国，张仪认为是“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将军司马错反对张仪的意见，主张伐蜀。司马错认为，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此时进攻韩国和周王，会受到天下人的指责。而且，韩、周会联合齐、魏甚至楚国共同抵抗，秦军取胜的把握并不大。蜀王本来就是无道昏君，现在又发生内乱，正是一举将其吞并的绝好时机。此时进攻蜀国，有“禁暴止乱之名”，堂堂正正，不会受到天下人的指责。而且，大军灭蜀之后，可以顺便将巴国一同灭掉。蜀国的富饶天下闻名，“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巴人强悍善战，灭了巴国，可以取得大量优良的兵员。更为重要的是，巴蜀据长江上游，水路可通往楚国，且水路运兵比陆路要便捷得多。这样就可以在蜀国打造大船，骁勇的秦兵加上强悍的巴卒，顺大江东下，十日之内大军即可抵达楚的扞关。最后，司马错总结道：

“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司马错的建议，为秦国勾画出一个扫平六国，实现统一的清晰思路，不愧远见卓识。张仪是战国著名的纵横家，也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舌辩之士。但这一次，他的主意实在不如司马错高明。

司马错，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九世祖。

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等人的意见。

秦灭巴、蜀之后，“益强，富厚，轻诸侯。”随后按照司马错的方针，以巴蜀的物资、兵员，顺岷江、长江而下，不断攻击楚国的侧背，蚕食楚国的疆土。最终吞并了这个强大的敌国，为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秦灭蜀 30 多年后，公元前 280 年，秦大将司马错率十万巴、蜀士卒，用一万艘战船装载军队和粮食辎重，顺岷江、长江而下，进攻楚国，实践自己借岷江之势攻楚的军事思想。这次军事行动开始十分顺利，秦军很快攻占了楚国的黔中地区（今重庆涪陵至贵州北部），设置了黔中郡。

三年之后，公元前 277 年，蜀郡守张若率秦军伐楚，攻占了楚国巫郡和长江南岸部分地方，并将其纳入黔中郡的版图。然而，秦军的攻势也就此停滞下来。公元前 276 年，楚襄王调集大军十余万大规模反攻秦军，很快收复了枳等 15 座城邑。公元前 273 年，秦、楚两国签订和议。此后，两国之间有了近 30 年的和平相处。

在这段时期，秦国开始大规模经营成都平原，将其建设成为伐楚的战略基地。

秦军的后勤中心在成都，为了保证战争物资顺利及时地调运补充，最好的办法是让成都直接成为物资启运的起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岷江主航道改道经过成都。这样，成都就可以真正成为秦国对楚战争西线的战略大本营。

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的，秦国对成都平原的岷江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兴建集灌溉、运输、防洪、供水的大型综合水利工程都江堰，从根本上消除水灾威胁，变水害为水利，改善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环境，这片肥沃的土地迅速成为丰饶的鱼米之乡，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的支持。成都也成为岷江水运的中心枢纽，快捷便利地为前线运输大量的兵员辎重。

愈加富强的秦国拥有蜀地丰富的战争物资，又大量征发强悍善战的巴人为兵，顺岷江、长江而下，不断攻击楚国的侧背，削弱楚国的力量，蚕食楚国的疆土，最终吞并了强大的楚国，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后人总结道：“秦并六国，自蜀始”^①。

此后的两千年中，这样的情况还多次出现。秦灭，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以巴蜀、汉中为后勤基地，宰相萧何“发蜀、汉（中）米万船而给助军粮。”^②刘邦虽然多次惨败于项羽，但在巴蜀地区人力物力源源不断的支持下，屡败屡战。终以垓下一战消灭项羽，成就统一大业。

三国后期，晋灭蜀汉以后，决定在成都建立水军基地，大将王濬在成都的二江（郫江、流江）上大规模打造战船，以顺长江而下讨伐孙吴。所造的“大

① 摘自《蜀鉴》。

② 摘自《华阳国志·蜀志》。

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造船的木屑顺流一直漂到长江下游的吴国。这是成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造船。“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伐吴的晋军乘坐这支庞大的船队，顺流而下，一举消灭了孙吴。这是成都为中国统一事业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贡献。

此后，隋灭陈、北宋终结十国，都是利用巴蜀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问鼎天下，终成大业。

对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在中国统一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清代大学者王夫之曾有这样的总结：“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扫叶，得势故也。”^①

其次，历史上中原地区发生战乱，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往往成为中央王朝的战略大后方。中央王朝在危难之际，常常将成都作为避难之所、退守和恢复中原的战略根据地以及重要的财赋供应地。

唐代，为避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唐玄宗和唐僖宗两位皇帝都曾避居成都，成都也一度改称“南京”，成为唐王朝的陪都。唐代中期以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成为唐朝廷最重要的财赋重地。当时，以剑南西川节度使出镇成都，大都是名垂青史的重要人物。许多人既是大名士大文豪，又是朝廷重臣。不少人甚至以宰相的身份出任封疆大吏。“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正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

由于重山屏障，当北方兵连祸结、赤地千里时，巴蜀地区仍然和平富庶，百姓安居乐业，成为中原人士的避难所。代表性的例子是：唐代为避安史之乱，大诗人杜甫入蜀避难，在成都卜居四年，写下了别具风格的“成都诗”。大批文人士大夫入蜀，为保留华夏文化，延续华夏文脉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成都和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

第三，当异族入侵，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就成为中央王朝的避难所和民族复兴的大后方，为抵御外侮、延续中华文脉、实现民族复兴源源不绝地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持。

南宋抗金和抗元、南明抗清，都曾把巴蜀地区作为战略基地。当历史进入20世纪，在抗日战争的危亡之际，成都的这种作用，再一次展现出来。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五代下》。

第二节 成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八年抗战，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最重要的区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的成都，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领导和团结各阶层群众，以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声势浩大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抗战八年，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一直是中华民族抗战最重要、最宽阔的大后方。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中国战时后方的军政副中心。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军政中心。由于四川在大后方的重要地位，为了控制和稳定四川，国民政府在成都设置中央级军事、行政领导机构，使成都军政地位仅次于战时首都重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对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控制，国民政府相继在重庆、西昌、桂林、西安和甘肃天水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或行辕，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派出机构。1939年，原设在重庆的四川行营迁到成都，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为抗战时期成都最高政治军事机构，职责主要是“督促指导川康两省地方军政事宜及办理指定事件”，设高级参谋2员、参议3员、秘书2员。成都行辕下设三处两科：第一处负责办理军事事项；第二处负责办理政治、军法事项；总务处负责办理会计、军务、交际、医务等事项。机要科办理文书、人事、收发、印信、电务等事项；调查科办理调查事项。另附设有医务所。成都行辕的设立，使国民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聚集全川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战，作为四川省会城市的成都成为仅次于陪都重庆的战时大后方军政副中心。

抗战时期，设置于成都的重要军政机构还有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和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

川康绥靖公署，是抗战前夕至成都解放，四川及西康地区军事活动的最高指挥机构。1936年11月19日，蒋介石为扶持刘湘统一四川军权，打破防区制，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撤销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和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川康绥靖公署，任命刘湘为主任；公署设于成都督院街，下设参谋长及秘书

处、军务处、新闻处、军需处等。1937年7月，川康绥靖公署调整组织结构，设参谋、秘书、副官、军务、经理、军医、交通等处。1940年4月，川康绥靖公署职权调整为：凡属军事和绥靖范围，如剿匪自卫、构筑工事与辖境内水陆警察、保安队以及地方自卫武力之调遣、整训、动用，均由绥靖公署主办。

四川省保安司令部，位于成都督院街。1935年初成立，是四川省政府的军事机关，国民政府任命刘湘兼任四川省保安司令，设副司令2人、参谋长1人，下设参谋、保安、民训、新闻、总务等处及人事、军法室。保安司令以后均由省主席兼任，保安司令部主要以保安处为主负责。

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于1938年6月，由四川省主席兼任军管区司令，主要负责全川的征兵工作。1941年9月，军管区改制，实行军、师两级管区制，撤销团管区，由军政部直接委派驻地建制部队主官兼任管区司令。征集壮丁后，直接补充部队，实行征、训、用合一。当时，四川全省设成茂、绵广、泸永、隆富、资简等22个师管区和征兵事务所。其中成茂师管区司令部驻成都市包家巷，下辖成都、绵阳、茂县三个团管区。成都团管区司令部管辖成都、华阳、新都、灌县、双流等12个地区，其下设成都市国民兵团，是统一管理征兵、训练的基层工作机构。

这些军政机构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四川的军政、民政的控制，稳定了四川作为大后方中心的局势，安定了民心。

抗战八年，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首先表现在四川军人的英勇抗战和勇于牺牲之上。从1937年至1945年，川军各部参与了抗战正面战场的大多数重大战役，包括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四次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等，以及远征印缅的作战。

抗战时期，四川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兵源提供地。抗战期间，川军前后共出征和补充兵员300多万人，除川军序列的各集团军外，四川军人还补充到国民革命军各部之中，当时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广大成都青年学生响应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加入中国远征军赴印度、缅甸作战，充分表现了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据统计，抗战中四川军人以身殉国者26.39万余人，负伤者35.62万余人，失踪者2.6万余人，阵前牺牲将领5人，共计64.6万余人，占全川参加抗日作战总人数的20%以上。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在当时国内各地军队中，川军的武器和装备最为简陋，但在历次对日作战中却表现得十分英勇，取得的战绩也为国人所瞩目。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抗战期间，四川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1941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施行“田赋征实”政策，将原来的田赋由征收货币改为直接征收粮食，并将田赋收入暂时全部收归中央。此后，田赋征实在四川全面推行。四川每年征收的粮食逐年大幅度上升，总共担负了大后方粮食征收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为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抗战爆发后，东部地区大批工厂内迁四川。其中内迁成都的数十家工厂和本地的一些中小型工厂，努力生产，保证抗战需要，并对稳定人民生活，发展城市经济起着积极作用。当时国统区绝大部分机器，以及化工、造纸等工业产品出自四川，对维持大后方的经济、补充军需民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坚持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成都，是大后方重要的文化教育基地。大批著名文化人迁居成都，他们的到来推动了成都文化的发展。战争爆发后，东部地区高等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纷纷向内地迁移，四川是内迁院校最集中的省区，占抗战时期内迁院校总数的一半。迁川的高等院校大部分集中于成都和重庆两地。内迁成都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聚集成都华西坝，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办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Big Five”（“华西五大”），事实上成为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集团，这是成都在战时高等院校中表现出的鲜明特色。当时的华西坝学府毗连，学子如云，许多海内知名的学者包括人文学者都曾在此任教。华西坝与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和江津白沙坝，是内迁院校最集中的地方，号称大后方的“文化四坝”。成都因此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的教育中心之一。

对日空中作战，是中国军队抗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在这个方面，成都发挥了特殊且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成都曾是中国空军指挥中枢的所在地，更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大的前进基地和后方基地。集结了中国空军的主要攻击力量，在对日空中作战，特别是对日军战争基地和设施的轰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都在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中的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正是本书所要详细论述的内容。

第二章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状况 和对日空中作战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中国空军的状况

一、中国空军的产生

中国近代航空和空军的产生，始于 20 世纪初的广东。1911 年，华侨飞行家冯如从美国携带自制飞机回国，在广州燕塘表演飞行，这是中国航空历史的开端。1913 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南苑创办航空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也是中国空军最初的产生。

20 世纪 20 年代，东北、广西、云南、山西、四川等地的军阀纷纷开始组建空军。其中以东北张作霖的空军力量最为强大。1920 年，张作霖开始组建空军，次年成立东三省航空处，开始以重金从国外购买飞机，延聘外籍教官，兴办航校。1925 年东北航空司令部成立，张学良兼任司令，下辖 5 支飞行队。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空军共拥有飞机 300 余架，是当时中国力量最雄厚的一支空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空军除调入关内参加内战的 20 余架飞机外，其余在沈阳的 262 架飞机全部被日本关东军缴获。当时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一支空中力量顷刻之间不复存在。

除东北空军外，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力量也比较雄厚。1920 年，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正式组建空军。1924 年，广东开始兴办广东航校，培养的飞行员成为日后中国空军的中坚力量。后来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飞行大队长张廷孟、丁纪徐等都是广东航校的毕业生。到 1932 年，广东空军总司令部辖 5 个飞行队，拥有飞机 100 余架，是当时中国空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余地方军阀的空军力量大多十分薄弱。飞机多则三五十架，一般只有一

二十余架，不仅型号杂乱，而且大多陈旧过时。

二、中国空军的创立

国民政府从1928年起开始建立军事航空力量。

1928年5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原北洋政府军政署航空司被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司令张静愚接收，改为军委会航空处。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军事案》，规定了发展海军、建设空军等五项国防计划原则。同年11月，军委会航空处改为航空署，隶属军委会军政部，雄斌任署长。航空署下设军务、航政、机械、教育等七科。

航空署与陆军署、海军署并列，负责空军的编制、组织、教育等事务。而空军的作战则直接归陆海空军总司令指挥。航空署辖4个航空队，有飞机24架。1930年底航空署迁到杭州，扩编为5个航空队、1个侦察队，有2个修理厂。1932年航空署缩编为4个航空队，同时设立南京、汉口、南昌、广州等航空站23处。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建设，国民政府空军初具规模，1933年空军成为与陆、海军并列的独立军种。

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指挥“围剿”红军，命航空署迁南昌，对航空署进行了一番调整。同年5月，航空署扩建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航空委员会设办公厅，以陈庆云为主任，负责日常事务，下设5处：第一处（参谋处）处长沈德燮；第二处（教育处）处长陈庆云兼；第三处（总务处）处长周德氏；第四处（技术处）处长钱昌祚；第五处（经理处）处长王家颐。航空委员会所属航空队扩编为8个队，并建立首都航空处，加紧筹划空军的全面建设。1935年6月，首都防空处改扩为防空委员会，还在南京、上海、洛阳、南昌设立了空军总站。

1936年1月，航空委员会迁回南京。4月，修正航空委员会编制，改办公厅主任为航空委员会主任，奉委员长之命统率整个空军，又增设秘书长1人。5月1日，航空委员会进行改组，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以周至柔、黄秉衡、陈庆云、黄光锐、毛邦初为委员，宋美龄出任秘书长，周至柔担任主任。航空委员会增设参事室，网罗一些航空界资历较深的人员，另辖5处14个科。在原空军部队的基础上，扩编为9个大队，辖有30个飞行中队，并将防空委员会改为防空处，直属军委会。鉴于广东空军实力较为雄厚，在广州设立空军总站。

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正式建立以前，航空委员会是中国空军在未独立成为兵种之前实际上的司令部。蒋介石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但不过问具体事

务，实权掌握在秘书长宋美龄手中。对于中国空军的建立，宋美龄起了十分特殊的作用。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面主持初创的中国空军，这是因为蒋介石明确意识到，建立现代的空军会涉及购买飞机所需的大笔款项，蒋介石不相信手下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妻子。因此，这位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国第一夫人，便把许多时间花在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和比较各种飞机零件优劣的技术刊物上。她独揽空军的人事和财政大权，特别是购买飞机，不容他人染指，中国在1935—1937年间向美国订购了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飞机及配件，这在当时是笔天文数字，完全由宋美龄一人经手。她还严格空军纪律，规定凡在这支精英部队中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1937年，宋美龄邀请美国退役上校陈纳德到中国当空军顾问，后来又组建了在中国的对日空中作战中具有非凡意义的“飞虎队”。空军飞行员大多出身富贵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宋美龄同他们大多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样，宋美龄以一介女流，实际上掌握了空军内部财权和人事权，成为中国空军实际上的领导人。宋美龄也因此被冠名为“中国空军之母”，这是史无前例的。

周至柔是中国空军的创始人之一，抗战中的中国空军主帅。他原名周百福，浙江临江县人，是蒋介石的大同乡。周至柔这个名字，是他1924年到黄埔军校任教官时改的。他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8期，与陈诚、罗卓英是同学，后由陈诚介绍，进入黄埔任教，这是他人生的大转折。黄埔军校前期学生后来将星闪烁、冠盖如云，黄埔军校前期的教官身价又比学生更高一等。黄埔军校兴办初期，学生羽翼未丰，蒋介石要倚重这批教官，因此教官的职务一路领先。后来抗战中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等人，当初都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周至柔跻身其中，自然也是仕途坦荡，由黄埔军校上尉教官做起，十年间历任团副、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1932年由陆军转入空军，任笕桥中央航校校长，第二年又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要职。

周至柔十分尊重宋美龄，除了自己负责的空军训练和作战以外，其他关于人员任用、经费使用等事项都唯蒋夫人马首是瞻。

周至柔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后，目睹时局的发展，深知中日之间的大战已经迫近，于是尽可能加速空军建设步伐。一方面大力训练飞行员，大量向国外订购作战飞机，另一方面秘密在各地修建许多军用机场，并准备充足的油料和弹药，同时还为各机场训练了大批地勤人员。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得以有力反击日机，周至柔功不可没。